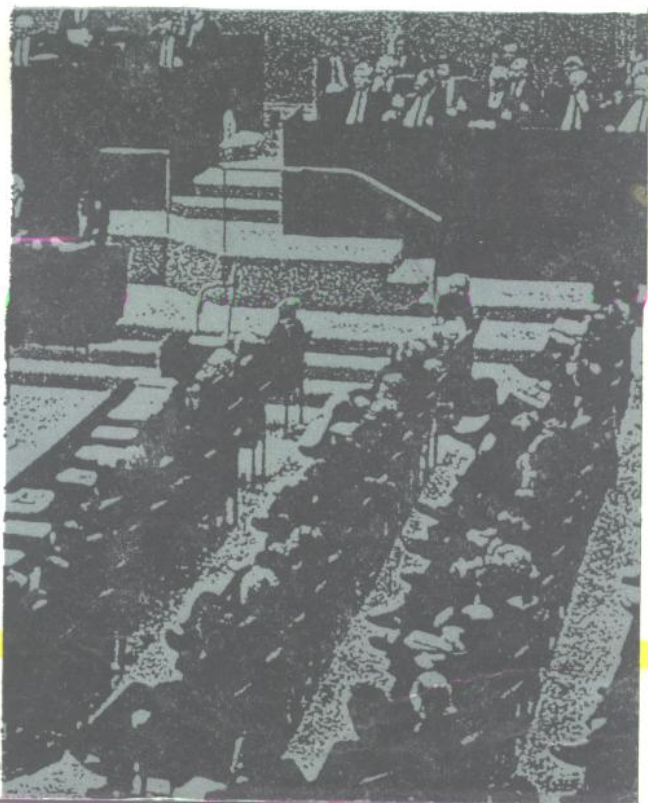


当代世界知识丛书

东欧巨变与 欧洲重建

陈乐民 著



东欧巨变与欧洲重建

陈乐民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俞纪民

封面设计:高荣生

东欧巨变与欧洲重建

陈乐民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成功信息公司排版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6 字数:130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012-0238-9/D·29 定价:2.80元

自序

这本小书写的是 1989 年和 1990 年的欧洲；主要想说明两点情况：第一，欧洲的东部地区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战后雅尔塔格局彻底瓦解，从此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第二，“欧洲统一”只是一个遥远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现实是本已存在的发展不平衡的四个“板块”的格局取代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分的“一分为二”格局。这四个“板块”从西向东指的是：欧洲共同体和自由贸易联盟国家；统一后的德国；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中欧、东欧；苏联的欧洲部分。德国虽然是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之一，但有着有别于其他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政治、经济特征和影响，它本身就是一个“板块”。这些“板块”之间和各自本身都包含着种种问题和矛盾。

在讨论这两点情况的时候，我随时都不离开以下两个着眼点：

一、这两年发生的事曾使人感到思想准备不足，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感。然而，这样的突变却非事起偶然，而是符合战后历史发展规律的。恩格斯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①从雅尔塔格局彻底瓦解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1 版，第 240 页。

的几十年的情况来看，这一格局的各种因素一直处在变动当中，格局形成之始，也就蕴藏着否定它的因素，东西双方都不是不变的，因而东西方关系也不能总是一个样子。简言之，我的第一个着眼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二、这本书所写的事完全是国际关系领域里的事，而不是讲欧洲国家的内政。例如东欧的演变，着眼点不是这些国家发生变化的内因，而是东欧变局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影响。讲德国统一问题，同样是着眼于这件事在欧洲大势中起的作用。至于欧洲共同体，它本身就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特殊形态，归根到底并不是一个国家。

写这样一本书，究其实是一种“急就章”，因为写的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无非是把一些材料搜集起来，稍加梳理，提出一些看法而已；用意在于引起读者对欧洲政局的关注。

几年前我曾撰写过一本《战后西欧国际关系》，那是从战后一直写到1984年发生的事件。写这本小册子时，由于难免要作些回顾，所以大体可以接得上。从这一点看，这本小册子也可算作是前一本书的“续篇”。

自结稿之日到出书，总还有一段时间，世界在变，欧洲在变；有些事情在读者拿到这本小册子时肯定又有新的发展了。

陈乐民

1991年2月20日

于北京东总布陋室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雅尔塔体系的终结	1
一、历史的回顾.....	1
二、东欧变局	11
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	23
四、裁军谈判与欧洲	37
五、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新职能	53
六、《新欧洲巴黎宪章》	63
第二章 欧洲共同体的现实与发展	72
一、从“罗马条约”到《单一欧洲文件》	72
二、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	83
三、政治联盟	89
四、政府间会议——曲折道路的里程碑.....	95
五、欧洲共同体的扩展问题.....	102
第三章 德国统一与欧洲	110
一、两德统一问题.....	110
二、各国对德国统一问题的反应.....	124
三、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	141
四、德国统一的国际条约.....	157
五、德国统一的完成.....	161
结束语——欧洲的“新轮廓”	171

第一章

雅尔塔体系的终结

一、历史的回顾

1989年下半年，东欧几个国家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剧烈的变化。这种状况表现在欧洲舞台上，最终导致战后“雅尔塔体系”的终结。战后形成的雅尔塔格局本带有浓重强烈的意识形态分野，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相互对立的体现。1989年下半年猝发的东欧变局使这种局面——欧洲“一分为二”的局面——彻底结束了。

这是战后几十年来欧洲政局中发生的最大变故；在最近两年里，欧洲从一个时期走向了另一个时期。然而，格局的形成和解体，都不是一、两年中偶然发生的。任何事变都不能同历史进程完全割裂开来。无数渐变（量变）积累到条件成熟时就发生突变（质变），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欧洲政局

从 17 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格局^①到 19 世纪的维也纳格局,^②到 20 世纪初的凡尔赛格局,^③到第二次大战后的雅尔塔格局,都不能逃脱这个历史规律。事实上,格局从来不是凝固的,在一种格局形成的时候就已孕育着变化的胚胎。

对于雅尔塔格局的解体,需要略微回顾一下历史。

雅尔塔体系,一般的理解,就是二战后出现的两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分庭抗礼的那种国际格局。雅尔塔格局及其内涵并不见于雅尔塔会议的文件。但是,这类意思在东西方的政治家们的讲话中是不少见的。例如,斯大林在论及“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时说,二战后,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④丘吉尔在富尔敦的讲话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他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特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

① 1618—1648 年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性战争,即“三十年战争”。结果于 1648 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宣布战争结束,划定欧洲大陆各国国界。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即指和约签订后的欧洲格局。——编者

② 欧洲各国为结束拿破仑战争于 1814 年 10 月至 1815 年 6 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旨在重新瓜分欧洲领土的维也纳会议。维也纳格局即指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形成的以英、普、俄、奥、法五大国力量均势为特征的欧洲格局。——编者

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美等国与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其后于 1919 年至 1920 年又同德国的盟国分别签订了对奥、对匈、对保、对土条约。凡尔赛格局即指和约签订后形成的欧洲格局。——编者

④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561 页。

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①（丘吉尔的富尔敦讲话作于1946年，把处于四国占领下的维也纳也划在苏联势力范围里了！——作者注）。总之，所谓雅尔塔体系或格局就是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它集中地反映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上。这种对峙造成了欧洲的、乃至世界范围的人们所习称的“冷战”局面。表现在欧洲的国际政治上则是从德国分裂开始，以东、西德的分界线为界，形成了政治概念的东欧和西欧；从军事上讲，西方的驻军和苏联的驻军所抵达的界线就是这条分界线。

然而，一种格局在形成中也就蕴涵着否定这种格局的因素。格局，说到底，是一种历史合力；是有关各方力量相互牵掣和抵消而形成的相对平衡的状态。因此任何一种“格局”都是一定历史时期中力量对比的反映。无论形成这种历史合力的哪一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原合力的调整、变化甚至突破，同时，一种新的历史合力便在孕育之中了。恩格斯关于历史合力的理论，对于分析国际局势的演变，是完全适用的。^②

应该说，战后形成的所谓雅尔塔格局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候的力量对比状况，或者说适应了当时东西方（首先是美国和苏联）的力量对比，因而对双方都是有制约作用的。实际上，战争临近结束的几次三大国或四大国会议，目的便在于根据当时情势作出战后安排：各自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和联盟结构，东西方相互制衡、互相防范；此后成立的北大西

① 温斯顿·丘吉尔：《演讲全集》第7卷，纽约，第72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版，第477页。

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竞相发展军事力量，都带有相当程度的防御性质。在“冷战”时期，特别是在“冷战”初期，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但却没有、也不可能衍为“热战”。

美苏均势的第一次重大调整，发生在 50 年代下半期。具体地说，第一，苏联和美国的核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苏联核力量的迅速发展大大地缩小了美苏之间的差距。尤其是 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标志着苏联在洲际导弹方面领先于美国。这件事立即引起美国的注意，艾森豪威尔从 10 月 8 日至 15 日连日召集有防务专家和科学家参加的会议，加速研究美国的火箭技术问题。艾森豪威尔 10 月 9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对美国落后于苏联表示“关切”，虽然苏联的人造卫星还没有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从此美苏的军备竞赛提高了门槛，均势时时被打破，又时时形成新的均势。总的形势是大体上势均力敌。苏联的卫星上天，推动美苏双方就保持均势问题进行谈判。1958 年 3 月 3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了一项法令，宣称只要其他国家不进行核试验，苏联也就不再进行试验。这之后不久，美、苏、英即从 10 月 3 日起召开了叫作“不继续核武器试验会议”的专家会议。这场长达五年的谈判结果，就是美、英、苏三国于 1963 年 8 月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接着，在 60 年代末，又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这两个条约对于控制两个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究竟起了多大的实际作用，此处姑且不去说它；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能够签订这样的条约至少表明，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力量对比已经到了需要达成某种政治上的妥协的程度，双方都感到有必要调整一下相互对峙的政策。从美国和它的

大西洋联盟盟国方面来说，美国在战后制定的“大规模报复”对苏战略已经不适用了，因为苏联也有了可以进行“大规模反报复”的手段。因此，美国肯尼迪政府提出了取代“大规模报复”的“灵活反应战略”，而后，北约于1967年将它确认为整个北约的对苏战略。从苏联方面来说，由于核力量的迅速发展，与美国战略力量大体上旗鼓相当，也就具备了以实力为后盾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折冲尊俎的条件。虽然各国舆论对这种战略的改变议论纷纷，但它终究标志着东西方相互弯弓待发的对立态势已经有了变化。在整个60年代，东西方都在寻求新的相处的方式，双方在经济、政治关系方面都悄悄地发生一些松动。60年代初有戴高乐提出的“缓和、谅解与合作”的对苏政策，60年代末则有旨在大幅度改善同苏联和东欧关系的“新东方政策”。而从麦克米伦到威尔逊政府，英国和苏联的经贸关系显然很有进展。60年代，虽有美国的侵越战争和苏联的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但从总的局势走向看，东西方关系在孕育着变化。

70年代上半期东西方的接近使人们向雅尔塔格局的前景提出质疑。特别是西欧各国（此时欧洲共同体已从六国扩大为十国）和美国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比起50年代，经过60年代“经济起飞”，西欧国家的经济实力普遍提高了，但同时却遇到了“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冲击。西欧承受了美元危机的打击，又要对付美国的新经济政策，不得不寻求共同对策。此时，尼克松政府在结束越南战争之后，转而向东方就全球问题探讨一揽子的安排方案：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的谈判导致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中欧裁军谈判的同时进行。这是一种“交易”：美国以同意苏联提议的“欧安会”方案换来了西方所要的中欧裁军谈判。西欧则欢迎欧

洲出现的和缓征兆，因为可以为西欧在欧洲打开“冷战”时期所不可能有的新天地。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美苏的接触却引起了西欧对美苏“越顶外交”的担心。而且美国多年来一直说美国的利益在全球，西欧盟国的政策应是区域性的；力量已经增长的东西欧对这类说法早已心怀芥蒂。一时间，美欧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相互 悟、相互顶撞的现象——从货币政策到农业补贴政策，从对中东的政策到西欧的防务负担，等等。美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了欧美关系中的新问题；尼克松把1973年定为“欧洲年”，就是要以足够的注意力修补美欧关系的篱笆、稳定住西欧盟国的情绪。

然而70年代上半期出现的缓和势头并没有否定雅尔塔格局。当时东西方有一种共同的谅解，就是在承认和尊重欧洲现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相互交往、改善气氛。欧安会的《最后文件》体现的就是这种既承认欧洲分裂的现实、又要相互交流的精神。

70年代后半期起出现了延续十年左右的“逆潮”，缓和受挫：欧洲中程导弹问题、阿富汗问题、波兰问题以及在东南亚、西南非等地发生的冲突都使东西方关系的短暂和缓局面出现了倒退。舆论界惊呼：“新冷战”到了。东西方的立场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又紧张地对立起来。

僵局之出现明显转机，可以说是从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开始。诚然在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的短暂时间里，东西方都想扭转一下紧张局势，作过些试探性的努力，但没有能形成气候。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会谈迈出了第一步。之后，双方都作了大量“和平”姿态。会晤时，双方谈到了各自削减一半战略武器的问题。欧洲中程导弹问题很快重新提上日程，终于得到解决，而且不停顿地去叩削减短

程导弹、限制战略武器以及裁减常规武器的大门了。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概括：戈尔巴乔夫提出“新的政治思维”推动了美苏关系迅速解冻，带动了裁军谈判的重开；不到几年期间，美苏关系的改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缓和潮流再一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滚动。

1989年初，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根舍说，这一年可能要成为“欧洲年”。根舍作这样的预言，其根据是欧洲正在进行东西方裁军、欧洲共同体“内部市场”和苏联、东欧几年来早已酝酿着的改革这三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裁军和欧洲共同体“内部市场”的进展是十分明显的。东欧则在下半年发生了迅猛的变化，终于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前面已说过，雅尔塔格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虽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从没有突破那个框架。1989年下半年的东欧变局则不然，它改变了苏联和这些国家相互关系的模式，战后格局的一个最突出的标志——德国的分裂——一下子便消失了，雅尔塔格局就此宣告终结。

对于这样一种局面，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马上就作出了反应。戈尔巴乔夫说：“战后时期恰恰正要在欧洲结束，这并非偶然。结束‘冷战’的社会政治后果和对外政策后果，恰恰在这里最突出地显示出来，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①法国总统密特朗说：“欧洲将不再是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所认识的那个欧洲，这是很显然的。昨天，它还依附于两个超级大国，将来，它将像人们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回到它的历史和地理中去。”^②西德总理科尔说：“我们古老的大陆欧洲又回来了，带

① 戈尔巴乔夫，1989年11月30日在意大利罗马市政厅的讲话。

② 密特朗：1989年12月31日《新年文告》。

着新的力量和新的自信心。我们驳斥了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人们关于即将面临‘欧洲硬化症’危险的忧郁的预言。今天，欧洲处在全世界政治事件的中心。它又是世界政治的主体了，不再只是世界政治的客体了。”^①

政治家们立场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异，但是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社会制度的不同把欧洲划分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欧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东欧的观念需要改变了；而东欧六国的变化说明这些国家不再在原来的社会主义轨道上运行了。人们所说的雅尔塔格局的解体，就是这个意思——东西欧不复处于对立状态。

然而，一种体系解体了，不等于一种新的体系立刻就形成了，原来的某些特征还存在着，有的很快发生了变化（如政权构成），有的则不可能一下子取消（如经济条件）。一些原有的关系也需要有一个时期才能变动（如原来的联盟结构）。所以，许多新的特征和许多固有的特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现实的。

上面引述的几位政治家的话，只能说明已经过去的事实，即战后体制的终结，但不能说明现在和将来。显然取代旧格局的并不就是统一的欧洲。

西方舆论界一种意见认为，欧洲将回到 1937 年的样子；也有的认为，欧洲将回到 1914 年以前的样子。这些意见带有相当的“即兴”性质。起码有三点不能这样类比。第一，这两个年代都意味着战争的前夜，而现在的欧洲则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直接冲突的动因。第二，现在欧洲已有了一个欧洲共

^① 科尔：1990 年 2 月 3 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欧洲——全体德意志人的未来》。

同体，它的成员国虽然只有 12 个国家，但是它的政治和经济触角和影响已大大超过 12 国的边界；它在欧洲具有很大吸引力，对欧洲政局起着凝聚的、稳定的作用。第三，现在的欧洲国家已不像过去那样拥有大片的海外殖民地，并为此进行猛烈的争斗。

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把欧洲的格局比作一个三个圈的“同心圆”：欧洲共同体是这个“同心圆”的“内核”，他把共同体成员国中对推进一体化不大积极的国家，如英国，算作“同心圆”的第一圈，第二圈是欧洲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如奥地利、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瑞士等，最后一圈则是有可能作为“联系国”的东欧等国。

“美、欧、日三边委员会”在 1989 年 7 月曾经发表了一份题为《东西方关系》的第 36 号文件，是法国德斯坦、日本中曾根和美国基辛格写的报告的详细摘要。这份文件认为，在欧洲将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实体。这就是：一，西欧，由欧洲共同体 12 个成员国所组成，正在日益形成成为单一的共同体；它既有其内向联系，又与欧洲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保持联系。二，苏联，但由于它的领土延伸至亚洲，因而不是一个完全的欧洲国家。三，中欧和东欧，这些国家独具特色，他们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并且参加东西方关于控制常规武器的谈判。同时，它们自古以来就是欧洲的一部分，因此它们日益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欧洲统一”的进程，并且想更多地掌握自己的命运。^①

这就说明，在新的形势面前，每个欧洲国家都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对策，以便尽量使局势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

^① 引自美国《外交》季刊，1989 年 7 月号。

展。各种不同的利益结成交错的、暂时的“联盟”是十分可能的。东欧变局后，这个地区的国家已不复把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规范在华约和经互会的范畴里，它们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联盟伙伴了。例如，匈牙利、捷克、波兰，地处中欧，发展水平大体相当，比起其他东欧国家更有与西欧和欧洲共同体发展关系的条件；而由于历史文化的传统因素，它们与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可以有较多往来。中欧五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在试图搞一种地区性的合作机制，五国外长和首脑已先后举行过会晤。再如，据西方评论者猜测，法国在保持和发展同德国的关系的同时，势必要谋求法、英、德“三角关系”的发展，以牵制德国力量的膨胀。英国保守党议员、下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戴维·豪威尔在访问波恩以后说：“我预计伦敦和巴黎应当积极地设法使德国免受中立主义的诱惑。欧洲的稳定要靠波恩—巴黎—伦敦形成的一种三角关系。”^①

总起来说，欧洲在 90 年代末肯定已经告别了战后形成的雅尔塔格局，这是欧洲政局 40 来年当中带有根本意义的变化。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欧洲将是一个既有强烈的联合趋向，又有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经济上既有日益增加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又有彼此间的保护主义；既有在部分国家间实行某种程度超国家安排的需要，又需保留国家主权的众多民族国家的欧洲。

① 引自法国《新观察家》杂志，1990 年 3 月 1 日至 7 日。

二、东欧变局

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年下半年相继发生剧烈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回答《世界知识》杂志记者的问题时说：“这些事情（指东欧局势的急剧变化）来得虽很突然，但都有长期形成的多方面的深刻原因。这些国家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多地是照搬苏联的一套做法。这些情况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使得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发挥和显示出应有的优越性，而且声誉受到很大影响。从外部条件来说，苏联‘新思维’的改革之风，西方‘和平演变’的鼓励政策，都对东欧的变化有影响，起了推动作用。当前东欧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程度之激烈，变化速度之快，是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①

东欧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选择了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是当时这些国家国内外诸因素决定的；特别是同苏联红军追击德国法西斯势力取得的胜利在这些国家产生的强大影响是分不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如罗斯福、丘吉尔等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已经预见到，苏联红军势力所及的中欧、东欧地区在战后势必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丘吉尔说：“苏军于1944年夏季之挺进中、东欧，使同俄国人就这些地区作出政治上

^① 引自《世界知识》杂志，1990年第1期。